

ОСНОВЫ
ЭЙД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20 世纪俄国经典文论译丛

彭甄 /// 主编

瓦·费·佩列韦尔泽夫 /// 著

宁琦 何和 王嘎 ///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形象诗学原理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形象诗学原理 / [俄] 佩列韦尔泽夫著; 宁琦, 何和, 王嘎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20 世纪俄国经典文论译丛)

ISBN7-5006-5847-8

I. 形... II. ①佩...②宁...③何...④王... III. 文学理论-俄罗斯-19 世纪

IV. 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1403 号

В. Ф. ПЕРЕВЕРЗЕВ

ОСНОВЫ ЭЙД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У ИСТОКОВ РУССКОГО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А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4—3978 号

责任编辑: 王钦仁

电 话: 010-84035821

书籍设计: 小马哥 橙子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发行电话: 010-64010813

邮购电话: 010-64049424

印 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00×1000mm

开 本: 1/16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 7-5006-5847-8/I·1180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总 序

20 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概观

彭甄

如果追根溯源,作为俄国文艺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俄国文学理论,经历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发展过程,于19世纪初开始形成独立的学科,俄国文学理论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整体范式上发生了突破性进展,对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在研究范式(包括公认的基础理论、定义、概念范畴和具体研究的方法模式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并取得了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这一状况的发生,其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二:一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19世纪末对伦琴射线、电子和放射性元素的发现,20世纪初量子论和相对论的提出以及之后诸多具有革命性的科学成就的取得)、哲学(19世纪后期新康德主义、现象学、新黑格尔主义、马赫主义、生命哲学和实用主义以及之后出现的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等流派的出现)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所取得的长足发展;二是文学理论学科内传统知识的积累,现代文学理论从以往传统中,特别是从18、19世纪的理论资源中汲取丰富的养料,由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出发开拓了崭新的学理空间。同时,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时代”:一方面,文学批评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历史成果进行广泛的适用和检验;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实践在对作家主体、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流派等现象进行评析的基础上不断概括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又为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资源。

20世纪俄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具备上述哲学和文化的宏观历史背景之外,在它起步之时还具备独特的理论资源——具有世界意义的19世纪文学创作实践和标志其文化高峰的“白银时代”的历史语境。首先,19世纪俄国文学在经历以往一个多世纪的“文学输入”之后,正逐步走向成熟并获得自身独立的“声音”,为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推举出一个史无前例的作家群体:А.С.普希金、Н.В.果戈理、И.С.屠格涅夫、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Л.Н.托尔斯泰和А.П.契诃夫等等,他们的创作实践和评论工作(包括别林斯基以降的批评家的文学评论)直接为文学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轫的“白银时代”文化所标举的“哲学复兴”和“诗艺复兴”,不仅提供出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巨人——В.С.索洛维约夫、Л.И.舍斯托夫、Н.А.别尔嘉耶夫、С.Н.布尔加科夫、В.В.罗赞诺夫、П.А.弗洛连斯基等等,而且还培养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群体——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А.А.勃洛克、А.别雷、И.Ф.安年斯基、А.А.阿赫玛托娃、О.Э.曼德尔施塔姆等等。俄国宗教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

的重新审视和批判、基于宗教观念对认识论的确立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求,为文学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本体论立场,而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其他类别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实践则又为文学研究开拓了独特的方法论空间。正是在适用这两种资源,并继承19世纪现实主义和学院派文论的基础之上,20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孕育出诸多学术流派,其体系多样、理论纷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学理论运动”局面。在这些学术流派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数“马克思主义学派”、“宗教哲学学派”、“形式主义学派”、“巴赫金学派”和“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这些学派及其他学派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欧洲文论乃至世界文论的发展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获得了世界性意义。

以下我们将对这五大学派发展状况进行简要的概括和梳理。

一 / / 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历史主义文学理论在特定社会政治语境下必然产生的逻辑阶段,俄国文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于19世纪后期。它通常将文学的形象及其塑造解释为人所处的“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产物。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有Г.Б.普列汉诺夫、А.Б.卢那察尔斯基、В.И.列宁、В.Б.沃罗夫斯基、В.М.弗里契、В.Ф.佩列尔韦泽夫和Г.Н.波斯别洛夫等等。马克思主义学派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文学艺术的起源、实质、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向,对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党性、人民性和民族性,对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以及它与经济基础、其他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研。该学派的代表著作有: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卢那察尔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学:关于艺术的对话》、《革命与艺术》和《列宁与文艺学》,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纪念赫尔岑》、《论无产阶级文化》和《一本有才气的书》,沃罗夫斯基的《维·格·别林斯基》、《论现代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性”》和《论马·高尔基》,弗里契的《普列汉诺夫与科学美学》和《艺术社会学》,佩列尔韦泽夫的《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之源》和《俄国现实主义之源》,以及波斯别洛夫的《文学理论》、《论艺术的本质》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等等。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文论的基本观点体现在以下两种学说之中:

文学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文论的早期代表,普列汉诺夫在一系列研究著作中,深入考察了艺术起源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学说。他的“五要素”说,即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式,精神道德状况,宗教、哲学和文学艺术”之间关系的学说是其考察文学艺术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前提。他强调各种意识形态依存于客观的社会历史因素,基于“一元论”的社会史观,揭示出文学艺术与社会存在的本质关系。文学艺术特质即是情感和思想的形象表现,其中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审美本身具有功利性,审美活动除了受制于个体的生理、心理条件之外,更决定于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包括种族特征和善的观念等)社会因素。文学艺术的发展则受制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它与经济基础、其他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影响,处于互动的总体态势之中。须强调指出,普列汉诺夫在肯认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现象”的本质的同时,反对将艺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作简单化和直线式的理解。他认为,相对于其他意识形态,艺术认识具有其独立性。在文学艺术中,“美的规律”(艺术性)则是艺术家对现实的深刻把握与运用形象完美的表达的高度统一。

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党性和人民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对“阶级”概念做出了严格的界定。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任何作家都隶属不同的阶级集团,作为“阶级的耳朵与喉舌”、“阶级的器官”和“阶级的感官”其作品也必然反映出本阶级的立场、情绪和期望等,所以文学艺术也必然具有其阶级属性。列宁进一步提出“两种文化”的思想:以往的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包含有“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两种成分。1905年,列宁完成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其中他明确提出写作事业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列宁赞成“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自由的写作”,反对“绝对自由”的观点。作家须具有无产阶级的党性,但是也应考虑到艺术创作的特殊性,应该绝对保证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思想、幻想、内容和形式等广阔的选择空间。无产阶级政党应遵循这一规律来领导写作事业。马克思主义学派将“人民性”理解为特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列宁强调“艺术属于人民”,艺术“必须在广大工人群众中间有其最深厚的基础”,“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必须深植在群众的感情和愿望中”,“必须鼓励和启发群众中的艺术家”,由此提出了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原则。

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文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学说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

下予以了发展和深化。

二 / / 宗教哲学学派。东正教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由于教父哲学的发展,它在7—8世纪得以繁荣。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在东正教哲学的框架内形成了“经院哲学”,其基本任务则是研究宗教世界观的内容。19世纪至20世纪东正教哲学的非教会派别提出了以下思想:教会改革思想、斯拉夫主义、“大同论”的形而上学和新宗教意识。这些思想旨在改革基督教、创立宗教观念体系以证明宗教有益于社会和人。其间,В.С.索洛维约夫为具有原创性的俄国宗教概念厘定出基本原则。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俄国形成了宗教哲学运动——“新宗教意识”。它在自由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有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Л.И.舍斯托夫、Н.О.洛斯基、Н.А.别尔嘉耶夫、С.Н.布尔加科夫、П.А.弗洛连斯基和В.В.罗赞诺夫等等。“新宗教意识”追求创立作为“社会性中心”和“文化核心”的宗教,它基于这一立场对文学艺术所给予的观照必然将创作活动与人的终极价值或目标的实现,以及信仰、求真等联系起来,从而导引出全新的文学观念。俄国宗教哲学学派文论的代表性著作有: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和新的流派》、《米·尤·莱蒙托夫:超人的诗人》和《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舍斯托夫的《托尔斯泰伯爵和弗·尼采学说中的善:哲学与布道》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悲剧哲学》,洛斯基的《价值与存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的《Sub Special Aeternatis.哲学的、社会的和文学的试验(1900—1906)》、《艺术的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论“文学的解体”》、《创造的意义》、《论人的使命》和《创造哲学、文化哲学和艺术哲学》,布尔加科夫的《赫尔岑的精神冲突》、《作为思想家的契诃夫》和《论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弗洛连斯基的《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确认》、《象征主义描写》、《语词的构造》和《造型艺术作品的时空分析》,罗赞诺夫的《历史的美学理解》、《在诗歌与哲学的边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诗作)》和《俄国文学的启示书》,等等。宗教哲学学派文论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作为创造的文学艺术创作与人的自由。别尔嘉耶夫将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创造活动与宗教加以联系,提出了“创造即宗教”的命题。他认为,创造即是“上帝的活动”,文学艺术创作则是基督教拯救的方式,是“三位一体的最后启示”。它的主题与之于上帝态度的性质相联系。文学

艺术创作是人之存在的证明：他的生命由于创作而获得意义，因为他正在继续上帝未竟的“创造事业”。在人类文化各种形式的创作之中，最重要的创作形式即是文学创作。作为人之于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文学创作的作用极为重要，它既是人的“创造天性”的实现，同时也是在文学作品内容层面对构成“存在”意义的问题的诉诸。文学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人是否能够保持自身的面貌，是否能够实现自身的自由、树立自身的信念。文学作品的伦理内容则表现为，人为获得自身精神解放的斗争：与人文主义强加于人的奴役所进行的斗争；与剥夺人的“最高自由”的行为所进行的斗争；与将人置于“社会决定论”桎梏的行为所进行的斗争。在更高的层次上，作家的创作生活则是纯粹的“爱”——对上帝的爱，亦即对人的爱。对上帝的爱是创造的动因，后者一方面解放被压迫的人，而另一方面则成为其存在的目标。作为一种力量，文学将自由、真和追求融于一身，它以美和爱去充实心灵。总之，正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人超越了“社会动物”的局限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高级生物，人的文学艺术活动具有实现自身“最高自由”的性质，它履行的是对上帝的直接义务，是人之存在的证明。

文学艺术创作与“求真”。弗洛连斯基从其宗教观出发，对诸如艺术符号与现实、象征与名称这些关涉到创作过程和作品存在本质的问题予以了关注。在此，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接受过程被加入到个人和人类认识上帝的活动之中。弗洛连斯基认为，艺术即是对“逻各斯”无可替代的直接表述，它显示出与无定形的、“混沌”的熵对立的力量。由于“混沌”否定存在的意义，包括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的使命则是终止这一“混沌”。文学的建构即是对“真”的全部内涵有意识或无意识追求的结果。文学文本标志作家对“语词”（“逻各斯”）持续的切近。在追求美的同时，他切近“真”（体现在基督形象中的“真”）——作为追求认识“真”的人，他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基督的自我认识。具体地说，诗人以及其他类型的艺术家，他的创作活动则是从信仰出发，基于宗教哲学观念和民族文化传统去追求信仰——“美”的形象中的“真”。他按照自己的风格、以间接的方式去选择通向上帝的道路：让智慧摆脱现代性的虚假命题，摆脱充满谬误的科学和哲学，以使接受者最终观察到由神赐所揭示的精神领域。

俄国宗教哲学学派文论基于新宗教意识，将文学艺术创作与人的终极价值的实现和对“真”的探求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文学创作的价值给定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空间。

三 / / 形式主义学派。形式主义学派又称“形式学派”。作为俄国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学理论,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形式主义文论的学术思想与什克洛夫斯基的《语词的复活》联系在一起。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语词的复活对于形式主义者而言是对词语所有被强调的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挣脱,同时也是对语词意识形态意义的取缔。语词首先是且主要是其音响的、经验的物质性和具体性。由此,形式主义文论的关于文本材料(语词)的价值指向便凸现出来。形式主义学派的学者包括“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以及艺术史研究所等的成员。其代表人物有:P.O.雅可布逊、B.B.什克洛夫斯基、Г.О.维诺库尔、M.H.彼得松、O.M.勃里克、B.B.日尔蒙斯基、Ю.Н.蒂尼亚诺夫、B.B.托马舍夫斯基、B.M.艾亨巴乌姆、П.Г.博加特廖夫、B.B.维诺格拉多夫、Л.П.雅库宾斯基、Ю.М.索科洛夫、A.M.佩什科夫斯基、С.Н.伯恩斯坦、Г.А.古科夫斯基、B.M.恩格尔哈特、С.Д.巴卢哈特等等。形式主义文论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诗学理论、散文理论、文学基本原理和童话研究等等,其中最具影响的学术著作有:雅可布逊的《语言学与诗学》、《语法的诗歌与诗歌的语法》和《诗学问题》,什克洛夫斯基的《关于散文理论》、《论散文》和《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材料与风格》,托马舍夫斯基的《形式方法》和《文学理论:诗学》,艾亨巴乌姆的《形式方法理论》,维诺格拉多夫的《诗学研究史(20年代)》,恩格尔哈特的《文学史中的形式方法》,等等。作为对18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反拨,形式主义文论对历史学、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研究范式给予了彻底颠覆。形式主义文论旨在创立一个独立的文学研究学科,基于这一学术目标,该学派的一项基础工作即是确定文学研究的对象及方法。由此,它创设出一套完整的文学研究系统范式(包括基础理论、概念术语和范畴等)。其中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术语,如“文学性”、“无意识化”、“陌生化”、“可感觉性”、“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本事和情节”、“变形”、“阻滞”、“材料和手法”等等,对以结构主义文论为代表的“形式研究”诸学派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发意义。形式主义文论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有以下几点:

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文学性”既是形式主义文论体系的出发性概念,同时也是其理论研究的主导性概念。“文学性”作为主导性概念的意义在于,它的提出为廓清文学理论学科边界、建设独立的文学研究学科奠定了学理基础。因此,就文学事实而言,它具有本体论性质,而对于文学学科而言,它则具有方法论性质。雅可布逊指出,文学理论的对象是文学性,亦即使一部作

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换言之,文学性是标志文学作品之于其他作品所具有的“质的差别”的元素。艾亨巴乌姆认为,文学性源自对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对比性差别的考证。它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某些因素的运用表现出来,因而它具有功能意义。文学性作为“质的差别”的元素同时也具有其历史内涵。当具有文学性的艺术手法和形式广为接受、变为创作惯例和公式时,所谓接受的“无意识化”即告形成。文学性由此开始式微。为保持可持续的文学性,则需要实现新的“陌生化”过程以达到“可感觉性”的功能。具体地说,就是将文学事实与其他事实予以对比以选择出一种与文学事实同质且具有不同功能的若干事实。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从历时的角度还是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文学性都与“可感觉性”与之“陌生化”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

文学创作与“陌生化”。作为“无意识化”的对应概念,“陌生化”最先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是指为克服“无意识化”、获得“可感觉性”,从而最终实现作品“文学性”的方法或者途径。具体地说,它是指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力求促使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偏离,从而产生奇特的效果。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目的即是让接受者最终感觉到事物,而非认知事物。艺术手法即是之于对象陌生化的手法,它将对象的形式变得复杂而繁难以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长。他认为,在艺术范畴中感觉行为本身正是目的,这一过程包含有审美意义,应该采取特定的方式加以延长。陌生化的具体手段各异,其中有形象描绘,对诗歌语言从语音、词汇到语法结构、语义结构的设置。什克洛夫斯基强调,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能够更新接受者对生活的经验和感觉。生活中的许多事物由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丧失了人们对之的关注。艺术的目的在于重建这种之于日常事物的感觉,突现出之于现实世界的独特的文本经验——此即文学艺术的价值之所在。托马舍夫斯基断言,现实素材只有经历陌生化过程才能成为文学作品的成分。为使之与文学作品的其他成分相互协调,应该使这些素材在表现方面具有新颖、独特的特征,亦即推陈出新、化常规为反常。“陌生化”理论后为布拉格学派所继承和发扬——后者将它与“功能结构”和“自主符号”等概念加以结合,认为“陌生化”理论在文学文体学和文学符号学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文论以其对文学研究学科的自觉和对文学特质的深刻把握,对20世纪世界范围内“结构研究”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演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四 / 巴赫金学派。作为20世纪俄国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论学派,巴赫金学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之前。它在广义上包括1918年成立的“涅维尔小组”和20年代的“列宁格勒小组”。其主要成员有:М.М.巴赫金、В.Н.沃洛希诺夫、В.З.鲁戈耶维奇、Б.М.祖巴金、А.В.蓬皮扬斯基、М.В.尤金娜、М.И.卡甘、И.И.索列尔京斯基、П.Н.梅德韦杰夫、Н.Ю.康拉德、А.А.弗兰科夫斯基、Б.В.扎列斯基和М.И.图比扬斯基等人。其中,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被认为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巴赫金学派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要有:巴赫金(包括合著)的《弗洛伊德主义》、《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文学与美学问题》和《语词创作的美学》,等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中,巴赫金学派的研究在哲学史、语言哲学、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化史以及人文学科方法论等领域均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在文学理论方面,该学派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学理论与形式主义学派的文学本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独具价值的文学研究概念和范畴,对当代文学理论诸学科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巴赫金学派的文论思想论题广泛,见解深刻,且在诸多研究方向上都成果卓著,其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的意识形态特质。巴赫金学派在批判个体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语言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巴赫金学派在考察语言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时,将语言视作社会交往的物质媒介,认为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通过语言符号完成自身的建构。沃洛希诺夫认为意识形态是现实的“物质部分”,其符号形式同样也具有物质属性。梅德韦杰夫则将意识形态视作物质、社会和符号建构的总和。巴赫金学派的语言哲学与当时盛行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相悖,其研究对象超越了抽象的语言体系,它将语言的社会现实性推向前景,于社会现实的语境之中分析语言,巴赫金学派由此提出语言研究的核心概念:言语和话语。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语言是在说话人的社会一言语互动中所完成的持续的生成过程。语言生成的规律则是具有社会性的规律,它的创造与意识形态及其价值相关联,而话语则是纯粹的社会结构。巴赫金学派的“超语言学”研究范式区别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它赋予语言以语境性、动态性和意识形态的价值性,为将语言的“复调”用法、“对话关系”和“双声语”(文学作品的话语构成)等现象纳入研究的视域奠定了学理基础。

文学作品的主体构成。巴赫金强调文学作品作为特定的艺术种类所具有的本质意义,反对将文学作品视作社会和作者双重影响的产物。巴赫金认为,文学并非文献、“书写”以及日常交际的“话语”。文学作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获得美学意义:一是它的读者的接受活动;二是在读者接受过程中对自身伦理经验的实现。总体上说,文学的意义或价值与其主体(作者、读者和主人公)关系的存在密切相关。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文学过程即是两个同等重要的“我”(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就读者与文学主人公的关系而言,作品的艺术意义则是读者与文学主人公之间创造性关系的结果;就作者与文学主人公关系而言,文学主人公源自作者的“视觉冗余”,而作者自身则决定于其“世界中的地位”的惟一性。由此,文学创作成为人对自身“人的惟一性”、对自身个性“面貌”的实现,而创作的途径则诉诸另一个“我”的惟一性和独创性。作者与文学主人公分享“视觉冗余”,尊重和维护后者的个性特征。作者在创作中塑造出另一个与自身意识对立的“主人公面貌”。就文学主人公与作者和读者关系而言,主人公的世界现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同时,与作者和读者趋于一致,构成美学对话的语境。总之,文学艺术即是具有个性的、意识到自身惟一性的两个“我”之间的对话,这两个“我”正在探索“永恒问题”的答案。“我”和“他者”的关系则是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必要条件。巴赫金关于“文学主体”的学说以其对主体精神和人文性的认同和强调与历史上的其他文论学派区别开来。

“复调小说”作为特定的体裁。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的过程中,引入了“复调”的概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它借助这一音乐学术语分析了陀氏小说在思想、艺术层面的开放性和多语性。在陀氏小说中,主人公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他们的声音互不融合、互相区别,共同实现着自身的“视觉冗余”。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创作的多语性超越了欧洲“独白小说”的传统。同时这种多语性也是其包容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等特殊伦理状况的表现。在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基于伦理层面的原创性得以确认。具体地说,复调由诸多各自独立的且具有平等价值的声音和意识构成。陀氏小说充满多重矛盾的要素,它们分属不同的世界和意识,并不统一于同一种视界。这些世界、意识和视界结合成复调小说的统一体,后者完成了对单声结构的超越。复调结构的艺术就是将诸多意志进行结合以建构事件。就作者主体而言,他的意识存在于小说之中,且具有高度的能动性,但他并不将主人公的意识视作客体,也不对它做出价值判断。作者意识与他者意识共存,且都具有未完成

性。作者意识的对象并非客体世界,而是他者及其世界。巴赫金指出,社会现实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为复调小说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学的前提。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语性,他对多元化世界所具有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以及他解读世界的天赋——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复调小说的完形。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复调小说的产生不仅标志小说体裁的发展,而且也标志人类艺术思维的巨大进步——这种思维对于把握“人的意识和人类生活的对话领域”具有开拓性影响。

文学—文化与“狂欢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等著作中,巴赫金对文学—文化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将文学语言的考察与对文化代码的确认结合起来。巴赫金将“狂欢化”定义为狂欢节式的庆祝、仪典和形式的总和。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出人类的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狂欢节即是省略舞台、消解演员和观众之间界限的一种游戏。就其本质而言,处于游戏中每一个人都成为了“出场人物”,他们追求戏剧的外延——以狂欢的方式去体验生活。在此,生活的现实逻辑——常规或者秩序通过“亲昵”、“附就”和“粗鄙”等方式受到了颠覆。伴随狂欢节的笑的,则是对崇高事物(权力、真理和秩序)的拆解过程。巴赫金认为,狂欢化作为特定的文化过程或方式对人类文化—文学的演化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它促成突破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思想体系和风格之间的壁垒,消除文学要素之间的对立,使之获得开放性;二是它作为人类特定的“世界感受”,帮助人们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去完成与世界和他人的“交往”,使人完成社会的建构,同时在肯认“相对”状态的基础上去反对“偏向”、“秩序”和“权威”。“狂欢化”理论以其对文化—文学历史的深刻把握,对文化学、文艺学和社会学均具有阐释力,且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所借鉴。

俄国巴赫金学派文论从社会语言和文学体裁的研究出发,将文学研究提升到“对话哲学”和“文化哲学”的高度,其学说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观念为当代文论研究所普遍认同。

五// 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是塔尔图符号学派和莫斯科符号学派的合称。该学派研究的理论资源可以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布拉格语言学派和心理学派,同时与法国结构主义思想也存在有学理上的联系。另外,60年代初的控制论、机器翻译、人工智能以及文化学研究的新思维均对该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20世纪60

年代初,莫斯科从事结构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学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随后成为苏联科学院斯拉夫语研究所结构类型学小组的成员)组成学术团体,以后形成“莫斯科符号学派”。1962年,他们召开主题为“符号系统结构研究”的学术会议,议题包括自然语言、文学艺术符号学和诗学分析的数学等。会后出版了系列论文汇编《符号系统结构研究讨论会》和《结构类型研究》。在以后的符号学研究中,不同领域的学者逐渐将工作主要集中于艺术文本和神话的符号学研究。其后,符号学研究的中心转移至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塔尔图大学多次召开“符号学讨论会”,定期举办符号系统研究的“夏季讨论班”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并陆续出版了《符号学系统论丛》(7部)、《第二性模式化系统之问题》报告集(5部),由此形成了以塔尔图大学命名的“塔尔图符号学派”。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Ю.М.洛特曼和Б.А.乌斯宾斯基以外,还有Б.Ф.叶戈罗夫、З.Г.敏茨、В.Н.托波罗夫、В.В.伊万诺夫和И.И.列夫津,以及В.М.加斯帕罗夫、П.А.鲁德涅夫、А.М.皮亚季戈尔斯基和А.А.扎利兹尼亚克等等。该学派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著作有:洛特曼的《结构诗学讲义》、《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艺术结构》、《艺术文本的结构》、《文化类型学论丛·文学理论教程资料(第一卷)》、《文化类型学论丛·文学理论教程资料(第二卷)》、《第二性模式化系统》、《诗歌文本分析》、《历史—文学语境中的文学传记·塔尔图大学教学笔记》、《论文选集》(第一卷:《文化符号学和类型学论丛》;第二卷:《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文学史论丛》;第三卷:《俄罗斯文学史论丛·其他种类艺术的理论和符号学·文化的机制》)和《关于俄罗斯文化的讨论·俄国贵族(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日常生活和传统)》,乌斯宾斯基的《结构类型学原则》、《语言的结构类型学》、《结构诗学》、《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起源问题》、《俄罗斯和斯拉夫语文学著作(1958—1990)》(26卷)、《〈文艺学和学派〉论集(1969—1976)》(2卷)和《符号系统论著(1964—1994)》(23卷),等等。

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各异,他们的专业领域涉及到诗学、古希腊罗马文学、语言学、神话学、艺术学和语言史等。对数学统计和逻辑分析工具的运用使得他们的研究呈现出实证性的数理化倾向。在文论研究方面,该学派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结构诗学”作为研究范式。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文论研究的范式特征在于它的“科学

性”和“纯客观性”。它与形式主义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形态学方法一脉相承,同时又与法国结构主义遥相呼应。符号学派文论的核心概念是“结构诗学”。后者可以被解释为基于结构分析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体系。它强调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的现象,而是其内在的结构,在此认知结构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被突出出来。根据结构主义观点,形象、题材、体裁、风格和诗律等都不具有独立意义,它们如同语言成分一样都处于与其他要素的关系之中。艺术文本意义的构成并非基于特定的“艺术材料”,作为节律学—语义学结构,它的实现依据各种对比关系。艺术文本的内质存在于各种表意的对比关系之中。符号学派理论的基本思路是:艺术是由与语言类似的符号所构成的系统,因而可以运用语言学方法去研究艺术。这里涉及到艺术的“语汇”和“语法”。符号学派研究的基本论题是艺术文本(文化文本)的系统性。系统概念的实质在于艺术文本被视作一个整体,后者大于其构成要素之和。这一概念的内涵还指示出结构层次的等级性。艺术文本包括两个层次的构成:它的第一层次运用自然语言完成,而第二层次则经由文本的有序性(文学手法和人物关系等)实现。第二层次对文本的美学功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文论的“结构诗学”范式指示出该派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文学艺术作为“第二性模式化系统”。“第二性模式化系统”是指基于其他语言而创设的语言。洛特曼认为,包括文学在内所有形式的艺术都属于“第二性模式化系统”,文学的艺术特性决定于以下事实:它作为“第二性模式化系统”基于自然语言构成。洛特曼指出,艺术是关于世界的艺术性模式而艺术活动则是现实的模式化过程。文学与其他种类的艺术一样,创立出关于现实的抽象模式。在创立艺术模式的过程中,某些特质和结构被列入对象范畴。艺术不总是并且几乎不属于“逼真”,较之外部世界,艺术作品中模式化的更是作者的内心世界。作者根据自身的世界观结构创立模式,而作者创立的模式又将自身的结构附加于他本人。因此“现实”实际上通过间接的方式、通过作家创立的现实模式影响着作家。模式并非思想,文学作品的结构即是被表现出来的艺术思想。艺术文本是严格的、最具有序性的“第二性模式化系统”。其中,艺术符号同时映射几个意义背景,经由符号在这些背景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关系。作为“第二性模式化系统”,文学艺术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交际功能和符号功能。前者的基础为关于“合理性”与“非合理性”的问题,而后的基础则是关于真与伪、真实与逼真的问题。

俄国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文论作为当代符号学文学理论重要的分支,在语言学、文艺

学和文化学等领域都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并且以其独特的研究视域和成果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承认。

由于篇幅所限,以上仅就20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给予了概括和梳理。实际上,俄国这一时期较具影响的学术流派尚有若干,如比较—历史学派、历史心理学派、象征主义学派、神话学派、弗洛伊德主义学派和历史诗学学派等等。它们均从自身的文学观念出发,基于自身独特的理论视角对作家、文学作品、创作方法、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现象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它们文学思想业已成为上一世纪俄国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俄国文学理论经历了百余年发展、演进的历史。作为“文学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一“关于文本的文本”的样态无可避免地决定于20世纪俄国社会—历史的现实水平——社会制度的变迁、政治权力的交接、主流意识形态的嬗递以及哲学—文化模式的转型。上述因素决定这一时期俄国文论的发展历史充满了曲折和困扰。然而,伴随着创始、断裂和质变的乃是对它的重建和持续的生长,甚至是新的增长和繁荣。也就是说,20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毕竟以其在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实绩,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发展提供了独具价值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肯定和认同。

M.H.阿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认为,在整个艺术过程中存在有四种相互关联的要素,它们是作品、艺术家、世界和读者。所有西方艺术理论都表现为一个特定的定向,即将作品与其他三个要素中的一个加以联系,基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定研究的对象框架——由此得出“模仿论”、“实用论”和“表现论”,同时通过对“零度联系”的选择,得出“客观论”。在此,前三种种理论范式可以被归结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后一种则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质言之,这两种研究方法分别反映出“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历史主义”路线上,20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宗教哲学学派、比较—历史学派、历史心理学派、神话学派、弗洛伊德主义学派等一系列学术流派的思想成果;而在“科学主义”路线上,俄国文论则提供了形式主义学派和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等学术流派的思想资源。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俄国文论在继承19世纪文论“历史主义”传统的同时,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哲学文化思潮等角度切入去考察文学,将文学理论研究提升到全新的高度:一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依据唯物史观,对文学艺术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以及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党性和人民性所作的界说和

阐释；二是宗教哲学学派从“创造即宗教”的命题出发，将文学艺术创作视作人的“最高自由”的实现和人的存在的意义之证明、视作对“真”的切近。宗教哲学学派正是在否定“社会决定论”的路径上，以“超历史主义”的方式表现出对“历史主义”的认同。其次，形式主义学派作为“文学的内部研究”首创者，第一次将“科学主义”全方位引入文学科学。该学派在文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的原创性思想，其具有“实证性”、“系统性”和“客观性”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标志着文学理论内部研究范式的全面转换，对继后的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基于此，形式主义学派成为现代“科学主义”文论的渊源。须强调指出，20世纪俄国文学理论还提出第三条路线——“历史—科学主义路线”。巴赫金学派和历史诗学学派的文论则是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基于对特定民族的文学创作、各种文学流派和体裁的考察，对艺术方法和手段予以分析和研究，并对其功能和价值进行给定。这种理论范式将研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文论研究既表现出深刻的历史内涵，又呈现出结构的系统性，从而为文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理论空间。因此，巴赫金学派和历史诗学学派在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框架中占据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20世纪俄国文学理论以其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范式和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丰富成果，成为世界文学理论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现代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20世纪俄国经典文论译丛》的编译旨在将20世纪俄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具有影响的学派的代表性著作陆续进行译介，俾使国内相关专业的读者对俄国文论发展的整体水平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和掌握。在翻译著作的遴选方面，编者依循以下标准：即原创性、影响性和代表性。具体地说，入选著作首先须是对于世界文论研究整体发展具有原创意义的著作；其次是其学术思想标志特定研究范式发展的水平、在俄国甚至国际上都具有影响的著作；第三是作为俄国文论整体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派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国内外现存资料的状况、翻译力量和出版发行等因素决定了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阶段性。我们期待这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全面完成。
